

中國聖統制建立的政治與社會關係

房志榮

前言

一九九六年天主教在中國有兩件值得紀念的事。一是五十年前聖統制的建立，一是七十年前六位國籍主教在羅馬受祝聖。台灣的天主教會為這兩項歷史要事分期慶祝，今年十二月初在輔仁大學開兩天的學術研討會以紀念聖統制的建立，明年（一九九七年）五月將另外開會紀念六位國籍主教祝聖。今將十二月六日至七日研討會的內容先予介紹，然後將本人演講的重點略予披露，以饗《鼎》雙月刊的讀者。

今次的學術研討會，是由台灣主教團主辦，輔仁大學承辦。十二月六日（週五）上午先由輔仁大學董事長台北教區狄剛總主教致歡迎詞，主教團團長高雄教區單國璽主教致開幕詞。應邀到臨致詞的貴賓包括教廷專使



石好德樞機主教、教廷駐華大使館代辦車納德蒙席、

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先生等。繼後，由羅光總主

教講「建立中國聖統制的意義」。下午由張春申神

父講「聖統制的神學省思」，谷寒松神父評論；再

由施森道蒙席講「中國聖統制的建立」，楊傳亮神

父評論。最後是晚宴，席中安排由徐英發主教致詞。

十二月七日（週六）上午由房志榮神父講「中

國教會聖統制建立的政治及社會關係」，趙雅博神

父評論；張奉箴神父講「兩項紀念的歷史省思」，

韓德力神父講「中國聖統制和普世聖統制的合作關

係」，均由劉嘉祥神父評論；下午由李震蒙席講「

二十世紀大陸天主教的回顧與展望」，薛保綸神父

評論；王愈榮主教講「兩項紀念給與中國教會的教

訓」，王伯尼蒙席評論。下午五點許閉幕。

本人在演講之始，先澄清「政治與社會關係」

是指在中國建立教會聖統制的政治與社會背景，及

聖統制建立之後在中國政治與社會上所發生的影響。

然後循著以下四個步驟發揮。

聖統制建立前的一些重要事件

首先，教宗本篤十五世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所公佈的《夫至大》通諭。（馬相伯的中譯文是「夫至大至聖之任務，其為吾主耶穌基利斯督言歸聖父之頃，所託付門弟子者曰：『汝其往普世，傳佈福音於萬世』也……。」）

其次，首任宗座代表剛恆毅主教於一九二二年來華，當時的國務卿嘉斯巴利樞機對剛主教說，中國已有很多傑出的官員，為何找不出幾個中國主教？

第三件大事是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二日在上海徐家匯所召開的「全國天主教教務會議」

，到會的有四十二位主教及五位監牧（其中二位是中國籍，是剛主教抵華後才任命的，在其回憶錄中有詳細的描寫，）苦修會會長，以及十二位傳教區代表，此外還有在華的各修會代表及中國神職多名。

北伐成功，中國統一後，教廷首先發出有名的「八一通電」（一九二六年），向全體中國人民祝

賀。統一後的中國，政治、社會、教育各方面進步神速，正走向現代國家之途。可惜日本的軍國主義覬覦中國的革新，挑撥「七七事件」，引發八年的抗日戰爭。及至一九四五年五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及八月的日本投降，中國已元氣喪盡，雖在一九四六年底召開了國民大會，制定了憲法，但已應付不了中國共產黨的挑戰。

與建立聖統制直接有關的事故

一九四五年聖誕節前夕，教宗庇護十二世宣佈了樞機團的國際化，這直接影響了中國聖統制的建立，因為在三十二位新樞機中有第一位歐美民族以外的樞機，就是中國的田耕莘，他那時還只是宗座代牧。新樞機中最受人歡迎的是紐約的史培爾曼、德國的馮卡倫，以及我們的田耕莘。

田樞機動身離開羅馬前，曾向教宗建議成立中國聖統，教宗庇護十二世欣然應允，於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頒佈《Quotidie Nos》（我們每天）通

諭，成立了中國教會聖統制。「這是一件重要而偉大的事實，不僅是對中國，而且也對所有的傳教區，都有崇高的歷史和宗教意義。」（剛恆毅主教一九四六年寫於羅馬，見於其回憶錄《零落孤葉》，頁370）

大陸聖統的夭折（1946-1955）

田樞機於一九四六年六月中旬返國，在首都南京以無線電向全國同胞講話。他說在三十二位新樞機中，他和史培爾曼及馮卡倫三人最受歡迎。他謙稱史、馮二人各有千秋，只有他受到的這份光榮是全國人民爭取來的，因此他是代表國家，代表全體國民在世界各地受到禮遇，接受光榮。他轉達了羅馬教宗對中國的殷切期望，並囑咐教友同胞合作創造新中國。

與此同時，于總主教則繼續推動他在重慶已經開始的中國各宗教的聯誼事工，認為宗教徒聯誼會運動如能普及全世界，對世界和平必有重大貢獻。

在建立中國聖統制時，教廷把于總主教安排在中華民國首都南京，把田樞機安排在故都北平，不僅是深謀遠慮，實可歸給聖神的啓發。田公、于公的智慧、信仰、胸襟不亞於任何世界級的領袖。若將二公與以前外國傳教士首長相比，其最大特點應該是不僅能放眼天下，胸懷世界，也能顧到斯土斯民，與之有文化上的認同。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能把普世教會與本地教會融為一體，把整個人類視為天主的子民。

在國共僵持不下，美國調解乏力的凝重氣氛中，大家走到了一九四六年的聖誕節。《益世報·南京晚刊》十二月二十五日的第一版有「國大閉幕禮主席，于主教謙讓，莫德惠當選」的消息；有國防部長白崇禧為南京《益世報》的題辭：民族復興節及耶穌聖誕節特刊「慶世界和平——祝人間安樂」，

還有田樞機在上海聖心醫院發的告教友書：「宗教無國界，救靈事業不分國籍」。

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教廷首任駐華公使黎培

理總主教於上午赴國民政府向蔣主席呈遞國書，在致詞中略述過去教廷與中國的交往史，而於今日達到高峰，他深感榮聲與喜悅。

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在大陸成立，一九五零年蘇州主教龔品梅出任上海主教，一九五一年中共驅逐黎培理公使出境，一九五二年二百二十位國籍神父和九十四位外籍傳教士被中共政府監禁，一九五五年七月，毛澤東宣佈一切私有財產收為國有，九月八日夜，上海龔品梅主教、二十一位神父、徐匯總修院三十多位修生被捕。全國各地掀起拘捕天主教領袖的大風暴。至此，教會聖統制在中國大陸夭折。

教會聖統在兩岸三地的分頭發展

(1952-1996)

一九五七年大陸成立「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一九八零年成立「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及「中國天

主教教務委員會」；一九八九年地下教會的一些主教和多位神父在陝西三原籌組另一個主教團，不久被政府取締，多位主教被捕，判以囚禁或勞改，一

九九二年九月中中國天主教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會中通過天主教愛國會及主教團的新章程。

台灣方面，一九五二年成立台灣聖統制，一九五九年田樞機來台任台北代理總主教，一九七四年亞洲主教團協會第一屆全體代表大會在台北召開，台灣的中國主教團擔任東道主。

香港方面，一九六九年徐誠斌神父任香港教區主教，一九七三年病逝，繼任的李宏基主教在位不到一年，一九七五年胡振中神父任香港教區主教，一九八八年榮昇樞機，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日胡樞機宣佈陳日君及湯漢兩位神父獲任命為香港教區的助理主教和輔理主教。

結束語

為國籍主教的晉品及中國聖統制的建立，雷鳴

遠神父和剛恆毅樞機二人功不可沒。他們建立的國籍修會可以繼承其遺志。我國首任兩位樞機田耕莘和于斌也是衆望所歸。

那些歲月教會藉著《益世報》表現了對社會及政治的關懷，並透過其報導和時事評析影響了當時的輿論界。于斌所推動的各宗教聯誼也為二十年後的梵二大公會議所肯定。這些向前看，向外走的做法在大陸上固然行不通，即便在台、港似乎也趕不上。

歷史的主宰在帶領著中國和中國教會歷史，三個中國主教團，加上香港及澳門兩個教區，在第三個千年來臨之際，仰賴聖神的指引和能力會逐步走向合一。

□